

引文格式: 王晨. 伦理德性的规范化改造: 历史渊源、概念重构与理论嬗变: 基于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的考察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2): 107-116.

伦理德性的规范化改造: 历史渊源、 概念重构与理论嬗变

——基于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的考察

王晨

摘要: 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最杰出的经院哲学家,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处境化改造, 发展出古典德性伦理学的又一经典形态。阿奎那运用经院哲学的实践人性论, 以良心概念为中介, 将自然法置入德性论框架之中, 并对伦理德性进行了重新诠释。经由阿奎那改造的德性论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具确定性, 对伦理德性的规范化改造一方面使得德性与规则的界限变得模糊,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实践目的论的弱化。对阿奎那的伦理德性改造方案的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德性和规则两种实践因素的差异, 为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支持。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阿奎那; 德性伦理学; 自然法; 明智

作者简介: 王晨, 哲学博士,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江苏省双创博士项目“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思想研究”(JSSCBS202110891); 常州大学博士人才引进项目“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思想演进研究”(ZMF21020058)。

中图分类号: B82-051; B503.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2.012

二十世纪中叶, 伊丽莎白·安斯康姆 (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 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中通过三个重要论断揭示了以规范性原则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哲学的缺陷。自此之后, 德性伦理学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强势复兴, 并与以道义论和功利主义为典型的规范伦理学形成竞争关系, 古典德性伦理思想也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菲利帕·福特 (Philippa Foot) 曾指出, 德性伦理学“最为系统的创立者是亚里士多德及混合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哲学的阿奎那”^[1]。自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作品经由翻译运动重新传入拉丁世界之后, 学术界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研究就未曾间断。与之相较,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在德性伦理学上的建树通常被视为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传统的宗教化改造和补充, 其独创性尚未受到充分重视。

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最重要的诠释者之一, 阿奎那的思想无疑极大地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然而, 据此就为阿奎那的思想贴上宗教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签, 那么这位全能博士恐怕就真的成“西西里的哑牛”了。阿奎那不仅系统性地掌握并疏通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 而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和思想中的诸多疑难, 也给出了明确且独到的解答。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将阿奎那的宗教立场悬置起来,将其视为一名力图发展古典理论的伦理学家,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改造在强化其普遍性和扩大适用范围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初衷。重新审视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改造,特别是他对伦理德性的诠释,不仅有助于澄清德性伦理思想史的演进脉络,而且对于进一步思考德性与规则的关系,从而准确把握当前德性伦理学的发展态势,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德性与规则的分殊——作为居间者的阿奎那德性伦理学

众所周知,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德性伦理学将目光聚焦于行动者之上,关注如何通过德性的涵养实现人生的卓越;而规范伦理学关注的中心是实践行动,并探索行动者基于怎样的规范性原则才能确保行动的正当性。阅读过《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读者一定会认同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的见解,即“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最明显、最惊人的不足或许是:《尼各马可伦理学》通篇都很少提到规则。而且,亚里士多德把服从规则的那部分道德,看做是服从城邦所颁布的法律”^{[2]190}。虽然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3]343},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德性与规则处于直接通约的关系之中,规则通常被当作某种外在于德性且相对独立的辅助要素来加以对待。也就是说,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充分认可规则的重要性,但在说明规则的重要性时,并非像现代以来的规则伦理学那样诉诸人类理性的绝对命令或人类行为的效果考量,而是诉诸德性赖以可能且德性能够成就的共同体生活的维系与繁荣^[4]。遵从逻各斯的德性教化帮助人实现自身的完善以及共同体的繁荣;法律则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恶,并通过对恶的禁绝为良善品质的获得和高贵人格的养成提供保障。通过这种界分,亚里士多德得以将德性而非规则作为其伦理探究的主要对象。

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研究方法的差异。对于幸福和美德的情境化研究和经验性阐述是古典德性伦理学的一大特征,然而这种自然主义和幸福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在以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常识性的研究,根本无法成为一种严格的哲学。在康德(Immanuel Kant)看来,“凡是把欲求能力的一个客体(质料)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实践原则,全都是经验性的,不能充当任何实践法则。……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全部都具有同一种性质,都隶属于自爱或者自己的幸福的普遍原则之下”^[5]。如果宽泛地将伦理德性视为质料性的实践原则,那么它们确实以幸福的实现为终极目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和德性绝非形式化的抽象原则,它们必须借由具体经验加以说明。康德提出的这两个命题一度导致了德性伦理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似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在一开始就错失了恰当的对象,那些来自雅典公民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也只不过是常识性的意见而已。面对这些质疑,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见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当亚里士多德撰写《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时,当他构造城邦、宪制、公民、各种政体、正义、幸福等概念时,他并不是发明这些术语并赋予它们随意的含义,他只不过是拾起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发现的符号,仔细地考察它们在日常用语中的各种含义,而且通过他的理论标准来衡量和阐明这些含义。”^[6]

与康德试图奠定立法的道德之基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的目的既不是对善本质的推测,也不是对义务语言的分析,而是使人善良的实际任务^{[7]13}。由于实践领域的主题往往带有不确定性,有教养的人也不该在此苛求失当的严格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是否真正高贵且

公正，不在于他是否能够认知某些确定的形式化规则并将其贯彻到所有行动之中，而恰恰在于他能够面对各种具体事务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用最恰当的方法切中目标。

从历史渊源和理论形态来看，阿奎那的德性伦理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和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的相关论述，将理智（*intellectuale*）、自由意志（*arbitrio liberum*）和行动主权（*per se potestativum*）作为人性的本质规定，以此对人的（*hominis*）行动与人性（*humanae*）行动做出区分，来确立其德性伦理学的研究起点。为进一步澄清人类道德实践的内在机制，阿奎那重点围绕理智和意志的关系问题，在理智主义立场上阐述了理智认识实践目的的能力及其对意志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意志作为理智的分有与派生对于实践行为的动力作用，通过道德心理学的方式考察了理智和意志在进行道德判断、获得道德知识、开展实践三段论推理等道德活动中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一套完备的实践人性论学说。在完成对实践活动形式原则的阐明之后，阿奎那转入了对于具体德性和情感的考察，通过对节制、勇敢、正义、明智这四种主要的习得德性和信、望、爱这三种主要的灌输德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德目分析；并通过对自然和超自然两个维度幸福的描绘，确立了独特的双重幸福观的目的论学说，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德性伦理学体系。

即便作为终极目的的属人的幸福被分段式的双重幸福论所替代，目的论的总体框架依然得到了系统性保留，作为实现幸福之重要手段的伦理德性也一并被阿奎那继承下来。不过，即便在十三世纪中叶，当亚里士多德已经被经院学者奉为哲学的化身，对于当时宗教界知识精英而言，这位“大哲学家”的教诲仍旧是不完备的。在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拉丁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当时普遍存在的倾向出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拉丁文评注文献中，即认为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的恒在，以及人类个体拥有认识这一道德法则的能力。自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起，经院学者都在尝试接受自然法理论并将其融合到道德研究之中，以便将古典德性伦理学从一种基于人类标准的伦理学转变为依赖于神圣基础的伦理学，而阿奎那无疑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

阿奎那版本的实践人性论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道德心理学；良心与自然法的关系成为阿奎那考虑道德选择的实践三段论的背景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自然法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阿奎那不仅将当时的实践生活和道德价值灌注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目之中，而且赋予了伦理德性更为形式化的解释。经过以上种种努力，阿奎那使得围绕伦理德性的哲学研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因此，如果将德性与规则二者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实践知识的客观性及其恰当的探究方法作为标尺，那么阿奎那的学说似乎是介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两端的居间者。

二、实践推理、良心与自然法——规范性原则的引入

比起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更加强调规范性原则在伦理实践中的作用。阿奎那将关于法律的详尽知识纳入其整个伦理学体系之中，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法律的探讨显然缺乏这种系统性。虽然阿奎那将法律视为“行动的外在根据”^[8]，以标识出它和作为行动内在根据之德性的区别，但法律和德性绝非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或者说二者是相互交织渗透的。如果像麦金泰尔认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是将法律规范视作涵养德性、实现幸福的补充性原则和公共价值秩序的保障，那么当《尼各马可伦理学》及其希腊文评注被译介到拉丁世界后，这一时期的道德理论家则更倾向于用他们熟悉的知识和术语重新诠释大哲学家提出的基本命题，其中就包括大

量的教会法和自然法知识。经院学者试图通过将实践三段论的演绎过程与自然法的永恒法则相结合,来找寻实践理性的普遍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与人类良心的内在力量或习惯中的永恒法则是一致的^[9]。和大阿尔伯特等前辈一样,阿奎那将良心和自然法作为考虑道德选择的实践三段论的大前提,并希望让这种规范性力量成为伦理实践的可靠性根据。因此,将“良心(*synderesis*)”和“良知(*conscientia*)”概念引入古典德性论体系之中并逐步发展成沟通德性和规则的桥梁就成为阿奎那改造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关键所在。

阿奎那将良心解释为一种能够把握第一实践原则的自然习性^{[10]103-105}。良心是实践理智先天具有的内在品质,它确认道德行动需要遵循的最普遍法则^{[11]577}。良知则是在良心的规定之下进行具体实践推理的结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实践推理活动的整个过程^{[10]105-107}。亚里士多德并未把良心视为伦理学术语加以研究,但是他确实关注到了实践行动的合法性根据这一问题。“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3]19-20}既然德性(*arete*)的本意是做得好,属人的善在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灵魂如何拥有德性就至少意味着灵魂以何种方式获得逻各斯的秩序。实践选择模仿了理论推理的演绎过程,一个特定的选择可以从普遍的命题中推导出来^{[7]7}。逻辑推导的结论结合了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认识和对相关具体事例的认识。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能够认识到人的本性在于趋善避恶(大前提),并且明确知道诚实或不说谎是善的(小前提),那么通过实践推理必然会得出人应该诚实或者人应该不说谎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提供普遍伦理原则的具体说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伦理学建立在人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发现实践推理的普遍前提和特定前提时,经验内容是基本条件,人们关于所有实践命题都没有先验知识。如果尝试给出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道德原则,那么它的最基本的表述可能是,人的行为应该追求幸福的实现,而这些行为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那些产生幸福的行为必须通过经验来加以认识,如果具体的行动是有效的,那么行动者总是会正确地选择。而对于无法做出正确选择的行动,除了道德知识的缺失之外,亚里士多德也关注了不能自制(*akrasia*)这样普遍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导致人们错误行动的根本原因并非与逻各斯的直接对立,而是由于无节制的激情或欲望宰制导致忽略理性道德原则的要求而在具体前提上产生错误判断^{[3]219}。

基督教学者接受希腊哲学的基本思想,不过,关于实践行动中的选择和决策问题,他们更愿意借助意志概念并采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加以说明,因为他们相信崇高的理性不会被情感和欲望的低等力量引入歧途。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认为,行动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意志,它为人类提供自主自律、自我决断和在是非之间选择的能力^[12]。虽然奥古斯丁接受斯多葛派关于永恒法则的普遍原则的自然认识,但他也承认意志接受或拒绝其命令的能力。他没有把道德错误归因于理智认识上的失败,而是用意志的自由选择来解释。善良意志是转向和坚持完美的存在而不是不完美的存在的原因,而邪恶意志则抛弃或拒绝善和真理^[13]。自由意志为人们在认识到道德法则义务性的同时仍然可以自由地违反法则提供了说明。中世纪的道德化,恰恰在于创造了有关对错的一般范畴和理解对错的一般模式——而法律的规则就来源于此^{[2]210}。

经院学者的道德行动理论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正确的逻各斯”概念和奥古斯丁的“自由选择(*liberum arbitrium*)”概念的综合运用。在面对理性为什么无法恰如其分地发挥其作用,从而导致不正确的道德行为时,阿奎那部分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他同意由于激情的影响,一般的道德原则在一个具体情况下被模糊了^{[14]317-320}。不过,阿奎那赋予了意志在决策过程中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理性自身永远不会是选择的效果因,自由选择依赖于意志,毋宁说理性是行为的

目的因，它的作用是提供实践目的并判断其是否是善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见义勇为具有某种道德价值，能够提升自己的勇敢、正义品质并进一步促进自身的完善时，他并不一定会在看到别人受欺负时挺身而出，因为在阿奎那看来，静观式的理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力量，见义勇为不仅需要行动者能够分辨是非，还需要他有强烈的行动意愿。自由选择行为的完善来自行动者凭借自身之力所做出的达到欲求对象的一系列行动，这个行动过程被阿奎那更为细致地表述为两个部分——理智的判断环节和意志的选择与行动环节。

理智本身并不能够直接导致道德行为，这不仅因为阿奎那将行为的动力因从理智中剥离了出来，而且在于他将亚里士多德那个能够仅凭自身就能根据经验知识完成实践三段论推理、确定行动方案的实践理智，削减为仅仅是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认识能力而已。在阿奎那看来，理智的最主要工作是对终极目的与自然法的认识。自然法的诫命通过自然习性的融合，成为一个普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即良心。良心作为每个道德主体所固有的自然习性，能够理解自然法最普遍的道德原则。阿奎那认为理性在实践领域也以理智直观的方式去认识该领域的第一法则，这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提到的^{[11]577}。虽然亚里士多德对道德行为的解释依赖于人类理性的标准，但是正确的逻各斯从未被赋予柏拉图主义式的本体论地位，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哲学的学科属性导致它无法宣称能够掌握思辨哲学那样的严格真理。

古典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描述人类获得幸福的方式，并在人类本性和德性的背景下考察幸福的意义。幸福是理性灵魂根据完全的德性而进行的实现活动，因此它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成就。幸福被称为伦理深思的第一原则，它不是理性命题，而是实践理论中的统一元素，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达到幸福这一终极目的，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善良的指示原则。明智（*phronesis*）之所以是比智慧（*sophia*）更为重要的美德，是因为它调节着包括沉思生活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以便让真正拥有这种美德的人能够认识到什么是属人的善，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明智提供了一种人类行为的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拒绝了任何并非由人类行为产生的普遍道德要求。然而，当阿奎那将良心及其背后的自然法原则引入伦理学体系那一刻，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明智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阿奎那明确指出：“是被称作良心的自然理性，而非明智，为伦理德性指定目的。”^[15]这意味着即便阿奎那仍然承认幸福和目的必要性，但是行为标准实质上已经从人类最完善的实践转移到自然法的普遍法则之上；即便明智必须认识到一个恰当的道德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却并非由明智自身设定，而只是从对永恒法的先天意识中唤起它而已。在这样做的时候，阿奎那改变了实践智慧的范围，它不再独立地决定道德命题，而仅仅是从预定的目的推断出逻辑上正确的手段。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支配着一生中整个选择范围的实践智慧，也就成了一种人们从确定的律法中推断出特定行为的机制和操练伦理德性的演绎过程。相应地，道德科学变成了一种更像思辨理论的学问，即如何从普遍的命令中推演出针对具体情况的正确决策。这种由普遍自然法则原则组成的道德概念，似乎与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美德概念相冲突；如果阿奎那承认自然法能够独立于幸福论，那么他的道德理论就包含了非目的论的元素^[16]。

三、以明智为中心的四主德诠释——伦理德性的规范化改造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一般伦理学部分阐述了他的德性论的总体架构，然后在特殊伦理学部分对具体德性进行了说明。然而，在这部道明会修士的教材中，阿奎那不仅在次序上首先讨论了信、望、爱三种灌输德性，之后才涉及习得的伦理德性，而且对伦理德性的解释总体上是基于宗

教语境的。例如,在考察勇敢或坚毅(*fortitudo*)时,阿奎那主要论述了殉道者的德性;在讨论节制(*temperantia*)时则围绕斋戒等仪轨展开。他清楚地意识到德性与实际行为和行动者的身份地位(*status*)相关^[17],雅典公民和僧侣的德性不可能完全相同。德性的涵养必须通过实践操练和经验积累,历史变迁所导致的背景性场域的变化以及不同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差异必定会造成生活方式和伦理实践的差别。即便经院学者沿袭了古希腊的部分德目,但是中世纪拉丁人和雅典公民所推崇的勇敢在内容上无疑是大相径庭的。来自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者的挑战将会使得跨历史文化的德性概念的统一性彻底解构。毫无疑问,阿奎那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的承袭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习惯和权威的敬重,然而他的学术旨趣并非恢复某种权威并将其定于一尊,而是借助伟大传统来确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范式。

在阿奎那看来,面对德性的语境化疑难,必须提出一种具有普遍内容的德性学说才能回应文化相对主义的疑难。“有两种潜能(*potentia*):一种是关于存在的潜能(*potentia ad esse*),一种是关于行动的潜能(*potentia ad agere*)。两种潜能的完善(*perfectio*)都被称为德性。”^{[14]58-59}德性之于实践不可或缺,并不在于它是一种经验和实证科学的归纳总结,而是因为它是人性所拥有的意志和理智机能的运用和实然状态,是行动得以完善的必要手段。虽然德性必须通过具体行动才能表现出来,但德性却不是由实践对象的偶然性塑造的。“德性没有‘来自什么的质料’(*materia ex qua*),……但是有‘关于什么的质料’(*materia circa quam*),即德性的对象。”^{[14]62}对象的作用在于区分德性的类别,却不能事先被包含在德性定义之中,否则既会丧失定义的普遍性,也会导致循环论证。就像人们可以说关于勇敢行为的德性,而不能说出于勇敢行为的德性那样,是德性成就了勇敢行为,而并非勇敢行为激发出德性。

“德性行动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自由选择(意志)的善用。”^{[14]57}既然伦理学考察的核心是人性行动,那么属于人的“做得好”显然就是对意志和理智的善用。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arete*)是做得好”的扩充式定义不仅赋予了德性一种祛经验化的说明,能够用人性行动的结构锚定德性的内在普遍性根据;而且为作为习性(*habitus*)之完善的德性与作为机能(*potentia*)的意志和理智提供了联结和置换的空间。然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德性是做得好”是针对“德性即知识”这一观点而强调德性之于伦理实践的过程性和现实性,而阿奎那的定义显然更容易让读者关注到结构性和手段性的善好,他关于伦理德性的形质论分析就是典型例证。

阿奎那和其他同时代的经院学者一样,将明智、正义、勇敢和节制这四种主要德性作为伦理德性的主要考察对象。他认为这四种德性可以从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看,德性的原则是理性定义的善。“明智是实现(*act*)理性之善的德性;正义是在操作中(*operation*)完成理性命令的正当义务的善;节制是对导致行动者违背(*against*)理性之激情的抑制(*curb*);而当激情使行动者对理性命令的坚持有所退却(*withdraw*)时,勇敢加强(*strengthen*)了行动者对理性命令的服从。”^{[14]120}从质料方面看,明智是发布命令的德性,正义是关于平等者之间义务的德性,节制是抑制触发性快乐和贪欲的德性,勇敢则是面对生命危险时体现出的德性^{[14]122-123}。通过对德性的质料和形式进行区分和阐述,阿奎那确定了四主德的普遍性内容。伦理德性的客观规定源于实践行动中意志和理智的作用方式,即便外部环境和实践对象经常改变,它们德性之养成的作用却并非本质性的,或者说培养德性的作用之一恰恰是为了抵御这些变动不居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形成稳定的品质。在完成了关于四种主要德性的说明后,阿奎那还认为,其他伦理德性可以根据四主德推论出来,因为它们可以回溯到共同的源头,即理智和意志综

合运用的人性行动。

根据阿奎那的解释不难发现，就四主德的形式方面而言，理性或理性命令成为中心概念并将伦理德性串联了起来，在这个结构中明智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阿奎那认为，作为人性机能（*potentia*）的理智（*intellectus*）有两种运作方式，即思辨性的运用和实践性的运用；理智能力以这两种方式运用之后便会产生两类德性——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知识主要是思辨理智的德性，伦理德性则与实践理智的关系更加密切。知识作为一种理智德性，其作用是获得正确的理性（*ratio recta*）；伦理德性作为关乎行动的高尚品质绝非静态的知识，也不是与理性相分离的情感力量，它们是正确理性的实现，而其中关键的德性就是明智。明智的作用在于帮助行动者根据正确理性的要求而采取恰当的行动，以及以恰当的方式完成这一行动。虽然人们在具体情境中经常会根据经验和习惯采取某些固定的行动方式并得到好的结果，但阿奎那认为，这种仅仅依据自然禀赋的优越和习惯而形成的“德性”并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德性^{[14]155-156}。善于盗窃的小偷或许能够得到大量的财富，但是机巧和敏捷并不足以让他获得幸福的生活，因为小偷缺失了正义、明智等德性。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认为各德目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而德性的完善必定是整体性的完善。“如果没有明智就不可能有伦理德性，同样如果没有伦理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14]156-157}阿奎那强调，只有遵循理性原则的实践活动才能塑造真正的德性，如果那些看似良善的行为没有伴随明智的深思熟虑，即便能够获得某些外在的善好，也无益于人格的完善和幸福的实现。

阿奎那以人性行动和实践理智（明智）为中心的德性论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践理论框架和价值判断体系，德性伦理学这种道德探究路径的有效性似乎也得到了捍卫。然而，阿奎那对伦理德性的阐释无论在形式还是质料方面，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都带有更强的规范性意味。亚里士多德关于构成德性之地基的人性自然的理解显然要比阿奎那更为宽泛。自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通过人的灵魂结构在自然本性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人类的良善提供指导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的成就。好人必须认识到在身体和灵魂的组合中产生的情感和欲望的影响，虽然作为行动和思考之原则的灵魂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未进一步提出更为具体的规则，他只是声称好人才能正确地把握到适度^{[3]58}。德性发展自人的自然本性和习惯，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完全接受人类的良善仅仅是按照习惯来生活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给予了明智的人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来决定通过哪些行为最终能够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7]13}。没有普遍的自然原则来衡量道德行为。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的手段”^{[3]204}。阿奎那部分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明智并不赋予德性实践目的；不过，阿奎那同时也宣称，实践目的和德性的关系应该被准确地表达为：“是名为良心的自然理性而非明智，为伦理德性指定目的”^[18]。虽然亚里士多德同意目的作为形式因和终极因对德性有推动作用，但是德性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也根据具体情况主动做出调整，以确保能够切中真正的目的而非主观的善。然而，在阿奎那的表述中，这个目的实质上是良心直观到的自然法普遍原则，而亚里士多德难以确定的完善人性则可被视为自然法诫命的第一原理——趋善避恶的一个样式。此刻，如果回到阿奎那关于四主德的阐述，我们将不难发现，借助人性行动、意志、理智、理性等概念证成的伦理德性似乎无须依赖目的的概念仍然可以成立，而至善的实践目的论也可以为另一种本体论承诺或形而上学前提所替代。

古典德性伦理学致力于为人的良善生活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南，其中既包括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也包括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丰富的生活样态，以及由社会统一性所保障的价值

秩序。亚里士多德将雅典城邦作为其伦理探究的背景性场域,并试图通过对日常社会现象的哲学分析来识别出高尚生活的理想类型。然而,十三世纪欧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人们不仅要面对各民族的风俗、不同教派信仰之间的差异,同时还面对世俗和灵性生活之间的张力。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一种可以容纳上述各种因素并化解其冲突的统一性秩序。为此,阿奎那构建了一个人类完善的层次结构,即广为人知的双重幸福观,其基础是灵魂的意志和理智能力。人类成就的顶峰是完善的幸福,它包括单纯的(simple)灵魂与第一存在的理智结合。虽然这样的结合对于复合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善行和好运在尘世中获得自然的幸福。根据阿奎那的说法,追求最高的幸福是人类所有选择背后的指示原则,因为每一种道德行为都是由于其对实现幸福的贡献而产生的善。

尽管阿奎那凭借卓越的综合能力构建了人生目的理论层面上的统一性,但是与他在别处的论述一样,这些学说对于伦理实践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理论层面的统一性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实体化,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没有创造出统一的社会格局,也没有阻断异质文明的相互交流;此外,在拉丁世界内部,教俗两界的明争暗斗无法产生新的共识,就连教会内部宗派之间所奉行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起行动的结果,经院学者们普遍更为强调意图的优先性。无论生活的样式多么丰富,人生如果有目的,那么终极目的只能是唯一的,即来世的至福。此生所有的努力并非为了抵挡厄运或追求世俗的成就,而仅仅是葆有灵魂的良善。在这样的文化中“德性(virtus)”似乎并不需要真正“做得好(arete)”,它不再强烈地要求自身的外在实现,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和稳定状态^[19]。通过涵养德性能够获得此生的幸福固然是好事,如果不能达至这一目的也无须烦恼,因为灵魂最终能够在来世的应许中得到真正的完善。在这样的精神旨趣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阿奎那所宣告的幸福生活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超越奥古斯丁的双城学说,比起良善生活的实现,两种学说都更加关注灵魂的内在化完善和彼岸的至福,只不过阿奎那对自然理性给予了更为积极的评价。

四、结论

作为最杰出的“大全”式经院学者,托马斯·阿奎那系统地总结了中世纪盛期的时代精神,并对当时几乎全部的理论关切进行了回应。与此同时,这位天使博士的学说体现出不懈的活力与跨越历史的价值。仅就伦理学而言,阿奎那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是此类文献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至今依然是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材料;而他本人的《神学大全》更是提供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德性伦理学体系,阿奎那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他的处理方法乃至具体论证都可以为当前德性伦理学研究提供灵感和启示。

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基督教道德理论的结合与调试这一举动本身就涉及德性伦理学的存在基础问题。无论是对具体德目的重新诠释,还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整体性改造,这些做法无不是在回应跨文化和跨语境的问题。作为德性伦理学中心概念的德目往往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性:德目生成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且通常由未加反思的习俗和生活习惯所固定;固定这些德目的伦理诉求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基督徒谦卑的美德在希腊人看来或许是某种恶,西方人也很难理解“百善孝为先”所蕴含的深刻伦理价值。如果德性伦理学最终无法超出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界限,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伦理教育手段和文化遗产工

具，既不能用来描述和指导人类普遍的道德行为模式，也不足以帮助人们突破特定文化的界限从而达到基本共识。阿奎那对伦理德性的形质论分析为德性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般性说明，这种将德性的质料即语境化成分暂时悬置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澄清诸德目的内在统一性及其与行动者的关系，同时也为拉丁人理解古希腊先贤的教化提供了帮助。面对当前德性伦理学研究因受反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而往往倾向于用描述性的方式开展德性研究的现状，阿奎那关于伦理德性的论述提供了一种存在论视角，启发研究者们超出特定文化语境的限制去探求伦理德性的一般规定。

德性与规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当今伦理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家几乎全盘否定伦理德性的道德价值，仅将其视为实用人类学考察的内容；而德性伦理学家又立场鲜明地宣称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差异，并且有意识地避免过多谈及道德规范。然而，作为德性伦理学家的阿奎那不仅自觉地面向了德性与规则的关系这一问题，而且给出了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处理方案。阿奎那基于实践人性论，以良心和明智为中介，把自然法和伦理德性关联起来。借由这种改造，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德性与规则的互补性关系也被阿奎那构造为以自然法原则为体、伦理德性为用的通约关系。一方面，规则以道德诫命的方式敦促德性开展道德实践；另一方面，德性以行动和目标的达成来落实规则。自然法并非单纯的诫命，而是从人类本性的各个侧面以及其必须的方式来加以应用的原则^[20]。因此，德性与规则统一于人类实践活动，规则更为侧重于潜在的认知，而德性更为侧重于现实的行动。阿奎那所构建的德性与规则的统一性这一目标及其论证策略值得当前卷入德性与规范之争的论战双方仔细审视，以克服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各自的理论局限，寻求实践哲学的统一范式。

不论身处什么时代，伦理教育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幸福、终极目的和自然法这些曾经一度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受到严重质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人们试图用简洁的理论勾勒出实践行动的原则，澄清道德义务。然而，仅凭对义务性道德法则的强调不仅难以激发出人们的道德情感，反倒会导致道德冷漠和庸俗化的底线思维；对自由和工具理性的乐观态度也极易转变成盲目的信心，并导致对社会历史进程和道德自我成长的错误估计。比起专注于研究行动规则的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教导人们去思考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和身份处境中恰当地组织欲求，以实现个人的发展和公共的利益。而阿奎那则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进一步提醒我们去思考满足这些期望和欲求的社会统一性和实践主体应当被如何塑造。

参考文献：

- [1] FOOT P. *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
- [2]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M]. 宋继杰，译. 2版.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4] 唐文明.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J]. 文史哲，2020（5）：15-25.
- [5]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M]. 李秋零，译注. 注释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0.
- [6]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M]. 段保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3.
- [7] CELANO A J. *Aristotle's Ethics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moral goodness and practical wisdo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8] 阿奎那. 神学大全：第6册 [M]. 刘俊余，译. 台南：碧岳学社，2008：1.
- [9] KRETZMANN N, KENNY A, PINBORG J.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from the rediscovery of*

- Aristotle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Scholasticism, 1100-16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00.
- [10] 阿奎那. 神学大全: 第3册 [M]. 刘俊余, 译. 台南: 碧岳学社, 2008.
- [11] 吴天岳. 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 [12] 弗雷德. 自由意志: 古典思想中的起源 [M]. 朗, 编. 陈玮, 徐向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206-207.
- [13] 奥古斯丁. 论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 [M]. 成官泯,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36.
- [14] 阿奎那. 神学大全: 第5册 [M]. 刘俊余, 译. 台南: 碧岳学社, 2008.
- [15] 阿奎那. 神学大全: 第9册 [M]. 胡安德, 译. 台南: 碧岳学社, 2008: 13.
- [16] IRWIN T.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Volume 1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6.
- [17] 阿奎那. 神学大全: 第7册 [M]. 胡安德, 译. 台南: 碧岳学社, 2008: 1-2.
- [18] 阿奎那. 神学大全: 第8册 [M]. 胡安德, 译. 台南: 碧岳学社, 2008: 13.
- [19] 李尔. 理解与欲求: 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 [M]. 刘玮,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178.
- [20] 麦金泰尔.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 百科全书派、谱系学和传统 [M]. 万俊人, 唐文明, 彭海燕, 等译. 万俊人,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37.

The Norm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Virtue: Historical Origins,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A Study of Thomas Aquinas' Ethical Thoughts

Wang Chen

Abstract: Thomas Aquinas,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scholarly philosopher in the Middle Ages, developed another classic form of classical virtue ethics through the contextual transformation of Aristotle's ethical ideas. Utilizing the practical human nature theory within scholastic philosophy, with the concept of conscience as a mediator, Aquinas integrated natural law into the virtue ethics framework, offering a new reinterpretation of ethical virtues. The theory of virtue modified by Aquinas gains increased clarity in form and content. The norm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virtues not only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virtue and rules, but also weakens the practical teleology. Reflection on Aquinas' transformation plan help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irtue and rules, providing support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virtue ethics.

Keywords: Aristotle; Aquinas; virtue ethics; natural law; prudence

(收稿日期: 2024-01-04; 责任编辑: 陈鸿)